

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与中国妇女现代启蒙

赵彦乔

摘要: 在传教需要、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的共同作用下,从 1890 年代初至 1930 年代末,在华新教传教士发起了一场旨在启蒙中国女性的西方文学译介活动。传教士以文学为载体,从社会责任、自我意识、婚姻家庭等多方面对中国女性进行现代思想的启蒙,促使她们思考自己的处境和角色。启蒙文学译介调和了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性主张,在基督教的精神坐标系下引入了与中国封建传统迥异的思想和文化,对中国妇女现代启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传教士; 中国妇女; 启蒙文学; 文学译介

中图分类号: D44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7)06-0145-13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06.014

一、引言

新教在国内惯称基督教,1807 年入华。在新教的传教史上,文化传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新教通过创办众多出版机构和发行大量书报杂志,企图以文字为载体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这是它与同时期天主教在传教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在新教出版物中,最受中国人关注的是译自西方的史地、科技、工程和法政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中凝聚了传教士期盼中国人由认可西方文化进而接受西方宗教的苦心。这些科技类西书广为人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普遍得到承认。不过,此类西书的目标读者是中国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是活动在中国社会前台的男性。新教会历来重视面向女性的传教工作,也翻译出版过不少面向女性的文学作品,除了基督教文学(狭义),也包含相当一部分以启蒙现代思想观念为目的的一般性文学。只是当时女性尚且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这些女性文学就更难引起社会的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沉寂在历史的角落里。在寥寥无几的相关研究中,《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在论及儿童文学时,提到了小说译作《小公主》,引述了出版机构广学会对该书的评价“是一本鼓励女子进取的小说,是青年女子不可不读的书”^{[1](P18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介绍了两部传教士翻译的女性小说《四姊妹》和《乱世女豪》。《四姊妹》被认为“有助于指导青少年女性建立积极健康的女性形象”^{[2](P323)}。《乱世女豪》的译者在译序中称:“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们中国女同胞的道德及强壮,故命二三女弟子共将此书译出,贡献全中国各界青年妇女”^{[3](P2)}。以上是在儿童文学的框架内对女性文学译著所做的宝贵研究。上述译著尽管客观上可能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但并不以文学为鹄的。从传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UGW160808);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赵彦乔,宗教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教士的翻译动机、预设读者和作品内容来看，从中国女性启蒙的角度来审视上述翻译文学，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可以称之为女性启蒙文学。

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兴起于 1890 年代初，自此蓬勃发展，直至 1930 年代后期日本侵华破坏传教活动才开始走下坡路，到 1940 年代仅有零星旧作再版。译者多是熟悉中国女性的女传教士。目标读者非常明确，“妇女可读”、“妇孺适用书目”等都是在广学会的新书介绍中常见的提示语。中长篇小说与短篇故事集兼而有之。题材从女子成长到婚姻家庭，无不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原作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并在西方风靡一时。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期英美主要的女性作家，像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苏珊·沃纳（Susan Warner）、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等都有多部小说被传教士译成汉语出版。翻译的目的，译者常在译序中特意申明，概括而言，即通过译介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力争破旧立新、启发中国女性向现代转型。因此，传教士们以导师自居的意味非常明显。而这些承载西方文化的文学作品，也的确在中国女性读者面前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世界，奇异而新鲜；作品中渗透的现代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浸染在封建传统中的中国女性读者来说，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本文从中国女性启蒙的角度探究传教士女性文学译介，探讨其成因及中西文化因子的交织互动，分析译介在中国妇女向现代转型中的意义及其主要局限性。

二、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的兴起

为什么传教士不传教，却转去翻译女性启蒙文学呢？这貌似离经叛道的行为背后，其实仍然隐藏着宗教之根。

（一）启蒙是扫除传教障碍的必要手段

传教士非常重视对中国女性的传教工作。多年的传教经历使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男性固执自负、冥顽不化，而女性却随和温顺、更易感化。他们认为，加强对中国人中“更温和的一半”的宣教工作，会使传教事业更易取得成效。另一方面，传教士透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看到了女性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传教士观察到，在中国的家庭里，与父亲相比，慈爱细心的母亲对子女的成长参与更多、影响更大，母亲的思想、言行潜移默化地塑造子女。男孩子长大成人后直接参与国家的发展，女孩子结婚生子、成为母亲，母亲对她们的教养由此被传承到下一代的教养上。这样，代代更替，代代人都受到女性的影响，女性就这样“微妙而不可抗拒地”对社会发展和宗教信仰发生作用^{[4](P115)}。如果能使中国的女性归信上帝，实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基于此乐观估计，传教士们甚至经常喊出类似“把中国的母亲和女儿交给我们，中国必很快奉予基督”的豪言壮语^{[5](P150)}。可见面向中国女性的传教工作在他们心中所占的分量。

然而，传教士很快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对女性的束缚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思想封闭愚昧，构成了向她们传教最大的障碍。很早就不断有人抱怨，中国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严重妨碍了他们正常的传教工作。男女同教堂做礼拜导致流言四起，使女信徒或慕道者非常难堪，也有很多人因此不敢再去教堂^{[6](P143)[7](P166)}。这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最终惊动了晚清统治者，为了维护男女大防，晚清统治者在 1871 年向外国驻华使节发布了关于清政府将严管传教活动的公告，其中明令禁止中国妇女参加基督教活动。统治者的干预一度在传教士中间引起恐慌，在传教士内部最大的交流平台《教务杂志》上讨论禁令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出现，仅第四卷就连续刊登了五篇，担忧和警惕溢于言表。中国旧式婚姻制度也被视为传教的麻烦制造者。传教士认为，早婚使女孩子早就挑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重担，很多人从此中断了与教会的联系，教会因而损失了很多信众或潜在信众。包办婚姻逼迫女教徒嫁给非教徒，这本身就违背基督教的原则，而婚后丈夫禁止她们参

加基督教礼拜活动也是常有的事^[8]。女性从小就处在封建纲常伦理的捆束下，习惯于顺从和忍耐，很少抗争。此外，封闭和排外心理使传教士很难走近她们，也令传教士头疼。有传教士列举了在中国妇女中传教的四个困难：（1）结识并赢得她们的好感；（2）她们对近教所招致的世俗嘲讽的恐惧；（3）旧习俗，包括早婚、包办婚姻、一夫多妻和裹脚的陋习；（4）为她们找工作^[8]。这种种的传教困难被传教士归结到一个总的根子，就是中国女性头脑蒙昧不开^[9]。因此，传教士坚信女性启蒙工作会极大地助益传教事业：“只要女性得到了启蒙，基督就会赢得世界，基督的目标就会实现”^{[10](P396)}。这样，女性启蒙就成了扫除传教障碍的必要手段，与传教事业成败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对启蒙必要性的认识并未能结出启蒙文学的果实，但启蒙呼声广泛而持续，却为1891年以后广学会集中翻译出版女性启蒙文学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

（二）广学会和李提摩太力主现代思想文化启蒙

女性启蒙文学活动真正兴起是从1891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出任广学会总干事开始的。教会的女性启蒙文学译作中，广学会出版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与广学会的宗旨和李提摩太个人对启蒙工作的认识和领导直接相关。

广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年的同文会，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意为“在中国人中间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协会”，1905年改称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文名称于1894年改为“广学会”，意为“广西方之学于中国”。广学会虽一度更名，但成立之初同文会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宗旨却被延续下来，这是它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够成为教会西学传播主力机构的基础，也是它能够成为女性启蒙文学发行主力机构的基础。

同文会成立的头几年里，由于人力、经费困难，设计管理尚不完善，并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出版传播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对广学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人物李提摩太登场了。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入华，1891年开始出任广学会总干事，全面负责广学会的工作，任职时间长达25年，他的个人思想和行为深深影响了广学会的出版事业，也为女性启蒙文学翻译出版被纳入广学会甚至其他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设想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李提摩太坚信启蒙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将一部分女性纳入重点启蒙对象的范围。李提摩太的启蒙工作思路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启蒙不仅是传教的手段，启蒙知识本身就构成传教的目的之一。在1900年纽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上，李提摩太应邀以广学会总干事的身份做了题为“基督教文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力陈启蒙知识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启蒙知识本身就是上帝的福音，是基督教文献传播的对象^[11]。关于基督教文献的范围，他的观点是：既然圣经记述了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所造，那么关于宇宙万物的一切知识都是基督教的知识，没有所谓的世俗知识和基督教知识之分。“宇宙力量的运行方式，支配自然和人类进步的规律，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大量地揭示给我们，使我们极大地拓展了对地球的主宰范围。把这些知识称作‘世俗的’或‘非宗教的’是与圣经不符的。这甚至是对上帝的亵渎和最卑鄙的忘恩负义。因此，我们必须在基督教文献中详尽地解释有关上帝所造万物的一切具有启蒙性质的发现。”^{[11](P598)}“基督教文献的范围应该与人类的需要相等同。”^{[11](P598)}李提摩太为传播启蒙知识找到了基督教思想依据。

不过，李提摩太也认可启蒙知识在传教过程中的工具性作用。他在报告中谈到：“不论是在野蛮还是文明的国家，在所有成功的传教工作中，圣经都需要其它书籍来做补充。为了赢得非基督教国家精英们的关注和敬意，我们必须把我们最有才智的人所取得的最高的成就提供给他们。我们必须为未启蒙国家的思想领袖们提供我们为自己的子女所提供的那种教育，稍有减损就不是基督教文献所应当涵盖的足够范围”^{[11](P598)}。不论是在传教的手段还是目的的维度上，李提摩太都坚持认为，“帮助中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12](P204)}。

李提摩太的个人思想非常契合广学会同时传播基督教和一般知识的出版宗旨。同时，李提摩太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这使得他的启蒙工作思想得以落实到行动上。他的启蒙工作目标性非常强。他精心挑选了对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 44 036 人作为重点启蒙对象，部分官员和文人家庭的妇女被明确列入其中，妇女与儿童合计约 4 000 人^{[13](P439)}。他到广学会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就是为这部分人制定的启蒙工作计划。这里摘录第二、三、四条内容^{[12](P204)}：

(2) 发行丛书和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 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 呼吁、鼓励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李提摩太对启蒙工作的极力推崇和女性被纳入文字启蒙对象是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李提摩太将教会长期忽视的现代思想文化传播视为启蒙工作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传教士 19 世纪出版的西学书目以声光电化等科技方面的内容为主，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书籍不多。李提摩太认为这样的启蒙出版状况存在严重缺陷，现代思想和文化本该是启蒙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实际工作中却被严重忽略。“如果我们拿起一本在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文献目录，看到现代思想和生活方面的重要主题是何等地匮乏，涉及的那一小部分处理得又是何等地粗劣，而全职从事文字工作的传教士仅有千分之五，我们会不禁为出版业的价值被严重忽视而羞愧难当。”^{[11](P599)}为加强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工作，李提摩太亲力亲为，经他亲自编撰或翻译的书籍很多，如《泰西新史揽要》、《中西四大政》、《新政策》、《列国变通兴盛记》、《大同学》、《时事新论》、《西铎》等。他还翻译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社会乌托邦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曾先后以“回头看记略”、“回头看”和“百年一觉”的中文书名多次再版，小说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和描绘对康梁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本人更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主题，但也亲自为女性启蒙撰写过《世界女族进化小史》。文学是思想文化的良好载体，并与女性感性的特点非常契合。在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大力推进现代思想文化启蒙的背景下，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的发生顺理成章。

李提摩太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思想对广学会影响深远，继任者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承其思路，也同样重视女性启蒙工作^[14]。因此，女性启蒙文学翻译出版活动在李提摩太卸任后得以延续。

毫无疑问，李提摩太对广学会的启蒙文学翻译活动起到了最直接、最关键的作用，但是，其个人行为却以弥漫于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自由派神学氛围为土壤。自由派神学为了阻止基督教被文明的发展一步步攻城掠地，力图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建构与阐释基督教，使基督教与现代性、与科学和解。自由派神学的本质，是在基督教的思想架构里，完全承认现代性的主张。李提摩太的启蒙工作思想，并非从天而降。

(三) 社会福音运动带来了大量愿意从事女性启蒙文学翻译的女传教士

社会福音运动关心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的思想使大批传教士志愿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它将大批女传教士送到中国，成为翻译和撰写女性启蒙文学的直接力量。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席卷欧美的社会福音运动，是与追求个人灵魂得救的福音相对的神学思潮和运动，主张基督徒不能只关心个人的救赎，更要关心社会改造，真正的基督徒担负着满足大众在教育、健康、改善生活条件等方面需求的社会责任。社会福音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美国浸

社会神学家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甚至提出：爱同伴、为同伴服务就是爱上帝、为上帝服务^{[15](P313)}。社会福音运动在美国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它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新教教会中出现了社会改良运动，各地都有很多教会志愿者投身到多种多样的社会慈善事业中，社会福音从思潮上升到实践。基督教青年会是社会福音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它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展开了教育、体育、文娱等多项社会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大力推动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将大批美国青年学生连同社会福音一起送到了中国。在1886年到1936年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送到海外传教的美国学生共计1万3千人，占到了美国所有海外传教士人数的一半^{[16](P57)}。在中国，从1900年开始，美国传教士人数就超过英国跃居欧美各国之首。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6636人，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占了半数，这3千多人中女性有2104人，占总数的2/3^{[17](P711)}。女性读物最高产的译者、中国第一份由书局出版的妇女杂志《女铎》的创办人——美国美以美会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入华的，时间是1887年，时年二十岁。这些学生传教士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较高的文化和综合素质，深受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传播，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入华后从事的是能发挥所长的教育和文字工作。实际上，到1911年，在华美国传教士足有半数不再传教^{[18](P17-18)}。

中国女性教育落后，大量女传教士本着“妇女工作为妇女”的宗旨，投身到教会女校的教学和女性读物的编译工作中，甚至出现一些以亮乐月为代表的一度专事女性读物编译的文字工作者。因此，女性启蒙读物基本都是女传教士翻译的。她们既教女性读书识字，讲授一般的科学知识，也通过提供专门的女性读物来传授现代思想和文化；后者的实现途径既包括面向社会发行女性读物，也包括在教会学校设置阅读课程或布置特定的阅读任务。美以美会开办的镇江女塾的课程章程显示，学生从第二学年直至第十二学年毕业都开设阅读课，其中二到六年级以小说和故事书为主要读物，二年级是各类地理风俗、训儿真言故事书，三到六年级的书目为：《亨利实录》、《蒙学浅说》、《安乐家》、《泰西通俗演义》、《天路历程》、《女训喻说》、《郭娜喜传》^{[13](P231)}。其中，《蒙学浅说》、《泰西通俗演义》和《女训喻说》等都具有启蒙的思想内容。

此外，19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学中家庭小说的兴盛，刚好为稍后时期在华传教士翻译女性启蒙文学提供了很好的书目来源。在西方世界曾盛极一时的《广大的世界》、《小勋爵》、《小妇人》、《秘密花园》等女性小说，都在这一时期被传教士译为中文出版。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本身就充满了进步理念，译文也相当忠实流畅，有的特为中国女性做了改动，增强了原作的教育和启蒙色彩。这样，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翻译活动，在传教需要、广学会倡导和社会福音运动刺激的共同影响下，适逢西方女性文学兴盛的良好契机，在1891年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繁盛期。

三、“为你自己思考”——启蒙文学之思想与译作示例

启蒙主义思想家康德在脍炙人口的《何谓启蒙主义？》一文中，以呼吁的口气说出“Sapere Aude！”即“为你自己思考！”，道出了启蒙主义的宗旨。传教士翻译女性启蒙文学的要义，即多方面启迪中国女性用现代观念思考个人的处境和角色。

（一）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为女子划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社会是男人的舞台，女子干预外界事务便是不守妇道。为了唤起女性的社会责任意识，传教士亮乐月会同中国弟子一起翻译了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罗慕拉》（Romola），1917年由广学会以“乱世文豪”的中文名出版。这部小说以15世纪末佛罗伦萨城邦的社会动荡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一个普通女子罗慕拉在个人磨难和社会生活的洗礼中获得责任和伦理意识的过程。虽为历史小说，并不以历史叙事为重点，主题是责任意

识和道德伦理。罗慕拉在道德成长中不仅更透彻地理解了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而且意识到了个人与社会的道德联系,获得了社会责任感,从婚姻家庭的小圈子里脱胎为一个成熟的公民。小说在英国面世后有这样的评论:“《罗慕拉》主要关注的是道德责任和权利的观念,这是非常现代的产物,更适合放在现代的场景中”^{[19](P137)}。传教士认为小说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道德伦理非常适合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尤其可帮助中国妇女超越家庭、担当社会责任。亮乐月在译序中这样写道:

……书中情节,正合此时中国社会现状。……不但如此,中国最大危险,就是许多青年新人物,虽受过很多的教育,各抱莫大志愿,然往往不肯牺牲一己,为国家谋公益,反要牺牲国家,为个人得权利。此种人与书中的梅提多又很相同。所以这提多结果,应当给一般青年人做一面镜子,并使他们见了提多妻子罗麦娜,知道一国的女子,若都有道德,都是强壮的,其国家必不致演出衰败及将要灭亡的景象。我今最大盼望,就是在我们中国女同胞的道德及强壮,故命二三女弟子共将此书译出,贡献全中国各界青年妇女。所望诸位读了以后,能够仿效这罗麦娜为人,如此,就可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上帝了^{[3](P2-3)}。

由于译者的初衷在于培养社会道德责任意识,译作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历史叙事,篇幅大幅压缩,但展现对道德和责任的思考的关键情节,如女主人公曲折痛苦的个人和社会经历、重获新的道德意识的过程及顿悟后投身社会救助活动的情节,在译作中都基本保留,体现了译作的现实指向性。译作题目也从主人公的名字改成了“乱世女豪”,愿中华女子群起效仿、为国献身的意味呼之欲出。与原著《罗慕拉》相比,为中国女性量体裁衣的《乱世女豪》,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所降低,却更能胜任传教士赋予它的启蒙任务。

(二) 女性的自我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在新文化运动“发现妇女”之前,女子教育从未超越“三从四德”,目的是培养男权社会的柔顺的奴婢。传教士深谙中国的女子教育传统。他们曾把《女儿经》、《女四书》等几部封建社会的女教经典译成英语刊登在《教务杂志》上供交流学习之用^{[20][21]}。被后世视为“美国汉学之父”的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女教用书后指出,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女性教育史上,塑造恭顺的贤妻良母的目的和内容保持了一贯性^[22]。及至新文化运动之后,视女性为独立的“人”的意识和教育在中国社会上上下下仍然严重缺失,女性自身也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因此,唤起女性自我意识被纳入了传教士的启蒙体系。

1914年,亮乐月与中国助手周澈朗翻译的小说《小公主》出版,译自伯内特的同名作品。讲述了一个富家女孩撒拉在家道败落沦为孤儿后备受寄宿学校虐待,但她坚信自己具有高贵的价值,不妥协、不自弃,最终苦尽甘来的故事。为了凸显女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女主人公被强行剥离了家庭关系。她怀着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坚定信念,百折不屈、顽强进取,最终战胜了困境。译文采用中国传统章回体的形式,第一回中评论说:

(撒拉若不是)能够十分忍耐受苦,又立一巴高望上的志向,恐怕他早已忧闷死了。……幸亏他的性情能够随着他的境遇改换,又能立一个大大的志向,不甘心久居人下,自起初到末了坚固不改。所以苦尽甘来的效果,他能收着。这真可以做贫穷人家小孩子的榜样。我试把这女孩子的历史仔细译出,请诸位学童上课之后无事时瞧瞧^{[23](P1-2)}。

自尊自强和进取的精神在这个早熟的女孩子身上得到了张扬。在封建伦理纲常主导女子教育的社会环境下,肯定和宣扬女子的个体价值、尊严和进取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译作虽然被压缩到两万字,却仍然具有文化价值。

女性自我意识的典范是《四姊妹》中的菊儿。《四姊妹》译自奥尔科特的名著《小妇人》上部,

由美国监理会女传教士贝厚德 (Martha E. Pyle) 和她的中国助手沈骏英翻译, 1925 年广学会出版。从现有文献来看, 这很可能是《小妇人》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四姊妹》以少女成长为主题。主人公菊儿完全是传统理想女性的反面: 讨厌淑女的装束和举止, 喜欢疯跑、骑马, 希望能上前线打仗; 讨厌针线活, 酷爱读书、写作。她不认可嫁作人妇相夫教子是女子的必然命运, 决意活出独特的人生: 读书, 写作, 成为大文豪, 实现自食其力和自我价值。菊儿否定了女子必须依附男性生存的人生路径, 为了理想和快乐宁愿选择独身。她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意识和追求, 正是启蒙的意图所在。

(三) 婚恋原则和准备

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下, 中国不可能出现对女子如何恋爱和择偶的指导。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 虽然在知识青年中婚姻自主风气渐开, 但即便是一少部分力争婚姻自由的新女性, 也都缺乏必要的婚恋启蒙, 不得不“自学成才”, 很多人除了有个“婚姻自由”的笼统观念, 在具体婚恋行为上相当盲目。中国现代女作家庐隐 1920 年代初信奉“只要有爱情, 你有妻子也不要紧”^{[24](135)}, 坚持与有妇之夫郭梦良恋爱结婚, 就是例证。

婚恋是女性成长中的重要课题。传教士一手反对包办婚姻, 一手着手进行合理的婚恋启蒙。《四姊妹》引入的西方婚恋观念, 既否定了中国旧式婚姻制度, 又为现代婚恋行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指导和示范。首先, 婚姻自主。马夫人鼓励女儿们自己睁开慧眼, 去挑选终身伴侣, 她只在必要的时候加以适当的引导。其次, 反对早婚, 提出男女都要心智成熟才可结婚。马夫人并不看好富有也正派的好邻居洛立, 就是因他“太年轻, 没有一定主见, 不很靠得住”^{[25](P284)}。她自己的女儿也至少要长到二十岁才能结婚。第三, 要为婚姻做必要的准备, 包括经济能力和理家能力。美格的未婚夫必须先谋得一份足够养家的职业, 而美格必须在结婚前学会打理家务的技能。第四, 正确理解个人品质、金钱、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就这个问题马夫人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 这里只能摘录点滴。

(夫人:) “……一个女子能为一个品学兼优的男子所爱, 实是最大的幸福。……不愿意你们效俗人的意见, 不重爱情, 专以金钱为鹄的。……金钱果然是一种重要的需用品, 能使用得法时, 金钱更是一种难得而可贵的东西, 然而我决不愿意你们视金钱为人生唯一的目的。与其让你们嫁作皇后而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我情愿让你们做一个爱情浓厚、愉快而满意的贫人之妻。”

美格叹息道: “倍而说的, 贫家女子若不极力向前, 就没有机会了。”

菊儿毅然道: “然则我们不妨就以处女终老。”

夫人道: “菊儿这话很确当。与其做不幸的妻子, 反不如终身独处, 无忧无虑。……”^{[25](P144-145)}

这些睿智的见解即使放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不过时, 对当时正试图从包办婚姻的牢笼中懵懵懂懂走出来的大多数中国女读者来说, 更是闻所未闻、弥足珍贵的婚恋启蒙。

《竹马天真》则触及了少年男女交往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纯真少年, 少年的母亲认为: “这种小儿女的爱情, 并没有害处”^{[26](P29)}。村里的少年男女情窦初开, 父母们看在眼里, 大多是这样思量的:

让他们这样光明正大的交际, 仗着学识的陶融, 父母师长的指示和教导, 比较似乎妥当些。这人生的大问题, 他们迟早总是要研究的。那些父母们到了这地步, 也只能这样想着, 承认这也是激励孩童们上学的好方法, 能去除许多男女孩童的懒病。他们默默观察那浓艳的友谊, 发芽, 开花, 而至于不知不觉地萎谢, 不禁感触到自己少年的情事^{[26](P89)}。

有个别母亲不这么想, 则被指“多虑”。母亲们在“家庭改良会”上谈起此事, 一致认为“这种交际实在没什么妨碍”^{[26](P90)}。

颇有意味的是译者通过改写插入了一段原著没有的议论：

读本书的诸君，请不要怪我爱描述这种情形。这并非是安乐村的特点，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这样。这书里所说的既是关系近世男女孩童的事迹，那（哪）里能把他们看做拘谨守礼的古人，而不准谈及这社交公开的问题呢^{[26](P90)}？

这段改写，使译者化解两性隔阂、开导现代两性关系的方式，由委婉的小说叙事转变为近乎直接的劝说，文化介入的意图相当明确。

（四）现代母亲教育

母亲教育是指对母亲进行教育，是为帮助女性担当母亲角色对女性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教育和女性自我教育的统一。这里的“母亲”是广义的，是对已为人母和将来要为人母的女性的统称^{[27](P197)}。

中国历史上本来并不缺乏母亲教育，不过，传统母亲教育是封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主要内容是教女子用封建伦理道德教养儿女，而且男儿是教养的重点对象，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母亲，都是由于成功地培养了出色的儿子。母亲要悉心教导男儿学习诗书礼义、求取功名仕途，教他忠君报国，对女儿则只教她谨守妇道即可。《女论语》之《训男女》篇言：“男人书堂，请延师傅。习学礼义，吟诗作赋，尊敬师儒，束修酒脯。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稍有不从，当加叱怒。”

传教士文学的启蒙意义在于，它传播具有人文精神的母亲教育，把人的发展本身作为教育的目的。前文提到，传教士非常看重母亲对一个民族未来的杠杆性影响。因此，传播现代教育理念，提升中国母亲的素质，成为启蒙文学翻译的重要内容。清朝覆亡后，传教士认为，“在旧礼教破坏之后，新礼教未建立之先，对父母将何以为蒙养准绳，是今日新中国儿童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28](P8)}。1916年广学会出版西方儿童教育故事书《蒙养准绳》，试图“用小说的体裁回答这一个问题”，广学会称该书“作小说看可，作儿童教育看亦无不可”^{[28](P8)}。该著是传教士对中国母亲教育的直接介入。

传教士承认女童发展的权利，引入了“男女平等”的观念，这是相对中国母亲教育最显而易见的进步。他们通过多部译作，塑造了一组生动感人的“女儿的母亲”形象，例如《竹马天真》中的潘夫人、《四姊妹》中的马夫人等。这些西方母亲珍爱女儿，送女儿进学校读书，在女孩的教育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传教士母亲教育的另一个进步，是告诉母亲们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成熟健全的“人”，而非追逐中国传统的功名利禄（对男子），或打造贤妻良母（对女儿）。小说《小英雄》，虽讲述一个贵族少年的故事，用意却在教育中国的母亲，传教士盛赞其“诚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好故事”^[29]。少年的母亲把儿子的品性培养置于一切功利性目的之上，在她眼里，连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学问都是次要的。对女儿的教育同样以育“人”为本，与中国培养贤妻良母的传统教育取向区别更大。《四姊妹》中马夫人的教育目标是：“我希望我的女儿们受高深的教育，举止高尚，性情和善；为人所恭敬，所爱慕，所崇拜；使你们的青年时代，充满着愉快和光明；睁开慧眼，去挑选你们的终身伴侣；为人处世，总要能有益于人而问心无愧……”^{[25](P144)}。马夫人在自立、社交、家庭和社会责任等诸多人生问题上都给予女儿理性的引导，为教养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此外，译作中的母亲们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而采取的曲折委婉、循循善诱的教育方式，对缺乏现代儿童观照的中国传统“训教式”家庭教育，也颇具启示意义。

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传教士翻译语境的文化因素是丰富而复杂的。在此只能刻画其中的几个面向，更多的启蒙思想及译作，如反映现代儿童观的《荷兰的双生子》，融入了现代保健理念的《赫德的故事》、《秘园》等，无法一一记述。然而，以上示例足以展示，不论事

涉哪种具体的启蒙思想，这些译书都承载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它们为封闭的中国女性打开了一扇窗，使之窥见世界的多样性、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激发她们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即在“睁眼看世界”以后“为你自己思考”。这是传教士启蒙文学翻译共同的、也是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四、启蒙文学译著对中国妇女现代启蒙的意义及局限性

（一）对中国妇女现代启蒙的意义

熊月之在其巨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了在近代西学东渐研究领域的一个共性问题：对西学东渐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13](P5)}。与西学东渐的其他课题相比，由于女性和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处境都更加独特和边缘，关于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之于中国妇女史的影响，留存下来的直接文献资料更加匮乏，因此其研究难度更大，也更加薄弱。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历史资料的内在联系中，间接考证当年的这场翻译活动对中国女性觉醒和向现代转型的影响。

译著的用途、使用范围和教会学校人口统计为后人提供了间接考证的第一条路径。首先有可靠的资料将传教士女性启蒙文学译作的流通范围指向了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女学生。

《小公主》的封面注有“学堂小说”四字，而第一回的标题即“译西事注重女界，演大意警告学童”。译者亦写道：“我试把这女孩子的历史仔细译出，请诸位学童上课之后无事时瞧瞧”^{[23](P2)}。据此推测，该著翻译的初衷就是为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提供课外读物。

一套1924年版的《竹马天真》，封面上盖有中、英文两个章，章上的文字分别是“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Library”和“华西大学护校委员会清点讫1951”。前者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即由英、美、加三国教会1905年联合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华西协和大学，1951年收归中国政府后更名为“华西大学”。也就是说，这本译著曾经是这所教会大学的图书馆藏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可借阅之列，并且理论上它的借阅主体的学科背景非常广泛（截至1917年，华西协和大学就已经建立起涵盖文、理、医、教育学等领域的17个系），且不限于女生。

《四姊妹》的美国译者贝厚德先后任苏州景海女塾、上海中西女塾的校长。广学会图书目录中称，“（该书的）英文本有很多的中学，尤其是女中，采为课本。本书的译文，流畅忠实。设读者与原文对照，则更有助益矣”^{[30](P11)}。译本的中文目录之前附有英文目录。学者宋莉华认为，译本很可能曾经在景海女塾和中西女塾被用作女学生的课外读物以及学习英语的汉英对照教材。这个推断是非常有道理的^{[2](P315)}。另一方面，译本初版于1925年，但1930年版明确标注了“第三版”字样。仅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就再版了三次之多。事实上，晚至1948年该译著还曾再版（中间时段的再版信息不详）。由此，笔者认为，这部译著的流通和影响范围远不限于译者任校长的两所女学。从情理上来推断，教会动用很大的人力财力来翻译出版这样一部三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也一定预设了更广的目标读者群，译著很可能在其他的教会学校和教外人群中都有流通。

教会实施的是自足的教育事业，教材自己编写，培养方式也自主决定。而当时可发挥现代教育功用的女性读物少之又少，教会翻译出版的新式书籍通过课堂或者课外阅读进入学生的培养体系，合情合理，也很合时宜。

教会学校女学生的规模是多少呢？1910—1912年，在各类教会学校就读的女学生总计60 000—70 000人，1912—1913年非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总计140 000人^{[31](P34)(P35)(P84ff)}；1924年，在教会大学就读的女学生总计451人，1922年全国非教会大学的女学生总数为887人^{[32](P3)}。在以上两组不同时期的数据中，教会女学生在全国女学生人数中的比例都高达三分之一上下。这个比例在整个民国时期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男女通招的学校中，教会学校女生的比例远高于非教会学校。1922

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女学生在学生总人数中的占比,教会大学是12%,而非教会大学仅为2.54%^{[32](P3)};到抗战前夕,新教兴办的中学和大学中女生比例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33](P213)(P215)}。由此看来,在接受新式教育的那一小部分中国女性中,在学校就可接触到传教士启蒙文学译作影响的人比例还是很高的;在中国女界内部,正是这一小部分新女性引领了整个中国妇女界的变革。海外学者 Ryan Dunch 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妇女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比目前所认识到的更加重要、更加复杂^[34]。上述论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然而,传教士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教会学校。译书同时面向社会出售,教会也通过向教外人员或机构赠书的方式扩大书籍的流通面。例如,之江大学校长和筹建者之一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与中国助手合译的西方名人小传集《使我们丰富的贫人》,1936年一月出版,二月份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收到了发行机构广学会从上海发来的赠书。这本读物向国人介绍了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弥尔顿、莫扎特等十四位西方名人的生平故事,是一本非常好的文化启蒙读物。面向国立图书馆的捐赠行为,有助于克服教会图书流通面的先天不足,将影响延伸到更加多元的人群,这当然包括教外的一般女性。

再版率是推算传教士译著接受和影响状况的另一个指征。传教士译著普遍都存在再版现象。高再版率是教会翻译出版事业的显著特点之一。

前述书目中,《赫德的故事》1929年初版,第二年即再版,此后,至少在1935年曾再版过;《四姊妹》至少出过四版;《小英雄》先后再版达五次之多。1941年版的《小英雄》提供了该书详细的历史版次信息:民国前六年一月,初版,2000本;民国十二年九月,再版,1000本;民国十九年四月,三版,1000本;民国廿一年八月,四版,1000本;民国三十年三月,五版,500本。高再版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译著存在比较旺盛的需求,读者众多。

此外,不少译著除了发行单行本,也在教会杂志上连载发表。《蒙养准绳》在1915年首发41页的单行本,但第二年即扩编了内容,再发96页的单行本,而在这之前的1914年曾被《女铎》报多期连载。长篇小说《秘园》也曾在1914—1918年间在《女铎》连载。借助杂志连载,译作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

熊月之在论及西学的影响时谈到:“学者论及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往往就是指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对于其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注意不够。例如,论及20世纪初西学的影响,论者每每以严译名著为例,其实,走进千家万户、莘莘学子朝夕诵读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其社会影响不知要比严译名著高出多少倍”^{[13](P5)}。流通在教会学校的女性启蒙文学译著润物无声般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读书女性。启蒙文学译介与传教士的其他事业合力构成了中国妇女启蒙和觉醒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启蒙文学译著的基督教精神参照

传教士启蒙文学译介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启蒙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传递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的同时,不可能超脱基督教这个大的精神坐标系。亮乐月翻译《罗慕拉》,虽然出发点是对女性进行社会责任意识的启蒙,可女性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最终的指向却是上帝:“所望诸位读了以后,能够仿效这罗麦娜为人,如此,就可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国、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上帝了”^{[3](P2)}。译作包含的基督教道德内容,主要源自原著本身,但译者也进行了部分改写,强化了基督教道德色彩。对此,前人已有研究^[35]。《小公主》虽意在唤起女性自我意识,但主人公能够通过个人奋斗苦尽甘来,前提是“冥冥中有主救他”^{[23](P1)}。这里重点以《四姊妹》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四姊妹》非常典型:它蕴含的现代思想极为丰富,然其上也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基督教氤氲。小说营造的是一个理想的现代基督教家庭,母亲马夫人是具有理性智慧的基督徒,四姊妹正是在基督教精神和理性思想的双重滋养下成长的。

基督教是主人公一家最高的人生哲学，是他们人生的指路灯，基督教理想贯穿在全文的大小故事中。例如，圣经中的重要伦理“爱邻居胜于爱自己”，马家人以各种方式自觉践行。在她们对贫苦邻居的一贯照料中有这样两件事。一是本该欢庆的圣诞早时晨，马家女儿们却忍着辘辘饥肠，将早餐让给邻居享用。二是“小圣人”培德在母亲出远门期间每天去看望和照料邻居家的病孩。病孩在培德怀抱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年幼的培德自己却因此被传染，重病不起，为后来丧命埋下了伏笔。小说还宣扬合乎基督教理想的性情和人格。四姊妹为了达到基督徒的标准常常警惕、约束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努力克制恶性情。当菊儿被愤怒和报复的恶性情所操控、险些置妹妹于死地、醒悟后因悔恨和懊恼而痛苦得无法自拔时，马夫人教导她，在克己修为的路上，求助于天父是解脱人生困苦的终极之道。小说中的仁爱、克制、奉献等品性和精神，表面看来，似乎与中国传统文化并无二致，但前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教徒修行中汲取动力的源泉也来自于上帝，它本质上是以基督教为内核的异质文化。

《四姊妹》一方面为中国女性奉上不少进步的家庭观念，另一方面，却着力美化基督教的家庭模式。例如，马夫人虽然教导女儿们应当承担对国家的责任，也赞成女儿独身、追求事业，但作为道德标杆的马家，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虽然直到小说结尾处在前线做军中牧师的男主人现身，但他却是家庭的精神主宰。他的影子不时地出现在故事中。他的每一封家书都鞭策着女儿们更加努力地完善品行。女主人一向以坚强、完美示人，而她正是依靠了丈夫的帮助才实现了自我成长；也只有丈夫的高大完美形象面前，她才被抹上一笔瑕疵。试看小说唯一一处呈现女主人弱点的叙事：

“那时全仗你的父亲。他永不发脾气，永不抱怨或是疑虑。他总是欢欢喜喜地忍耐工作。他帮助我，安慰我。他提醒我，使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孩子们的模范；我希望孩子们将来长成怎样的人格，一定要自己先实行给他们看。”

……

菊儿道：“我看见父亲有时把手指竖在口边，用着慈祥而严正的眼光看住你，你就咬紧嘴唇走开。可是他那样做时就是在那里提醒你？”

夫人道：“正是。我请他这样帮助我，他永不忘记。就是这小小的举动，仁爱的眼光，使我得益不浅。”^{[25](P120-121)}

这个永不发脾气、永不抱怨、永不疑虑、永不忘记、永远完美的圣徒，简直就是天父的化身！然而作者和译者都不满足于化身，她们将天父本尊请到了前台：

（马夫人：）“我还有一个比你父亲更可靠的朋友，他能安慰我，扶持我。儿呀，你是才入世途，初尝到人性的困苦试探，那前途的荆棘或者更是稠密难堪；但是你若能全心依靠天上的父亲，就不难克胜一切而安然经过那些难关。须知你越爱他，越信任他，就越觉得和他接近，而把尘世上的荣华富贵，看得非常淡漠。天父的爱永不改变，也决没人能从你身上夺去。他是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健康的源流。希望你能信我这话，凡遇自己犯了罪或是有什么不如意事，尽可向天父求救。你对于天父须向对父母一样的坦白真挚。”^{[25](P122)}

在理想的基督教家庭中，即使女性具有现代的智识和行动能力，家庭的主宰仍然是男性。这在根本上是由最高主宰上帝作为完美父性的存在所决定的。

启蒙和基督教就这样达成了妥协，并存于以《四姊妹》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中。译著在现代主义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启迪女性理性思考和生活，基督教始终是译著共同的精神参照。由此折射出了译者的传教士身份。他们从事着启蒙中国女性的文字工作，却不忘自己来华的根本使命。女性启蒙文学译介是置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视野中进行的。

五、结 语

女性启蒙文学译介言在文学之中,意在文学之外。传教士译者“醉翁之意不在酒”,本着“赢得了女性,就赢得了中国”的信念和提升女性福祉的社会福音理想,不遗余力地投身到中国女性启蒙的热潮中。启蒙文学译介,是他们在“中华归主”的路上煞费苦心的努力,包含着他们矢志不渝的宗教热忱。尽管基督教是其永恒的精神坐标,但译作传达的现代思想,对于数千年封建教育下的中国女性来说无疑具有启蒙的价值。如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陶飞亚所指出:“对中国女信徒来说,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她们反思封建文化弊病的开始”^{[36](P12)}。女信徒在中国女性总人口中的比重虽然很微小,但在读书女性中,女信徒的比例却很可观。她们是开女界风气之先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从中国基督教史还是中国妇女史书写的角度,抑或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视野中,传教士在中国妇女现代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宋莉华. 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 宋莉华.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 [英]乔治·艾略特. 乱世女豪[M]. [美]亮乐月,译. 上海:广学会,1917.
- [4] F. I. W. V. The women of China[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3, (24).
- [5] Griffith, J. The Chinese circular on foreign missions[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72, (4).
- [6] Wheeler, L. N. Epitome of the Chinese despatch[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72, (4).
- [7] Boomerang. The proposed missionary regulations[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72, (4).
- [8] James, W. Annu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hina Christian mission[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5, (26).
- [9] James, W. Holy spirit in relation to our work[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7, (28).
- [10] Fisher, E. M. The enlightenment of our native Christian women. How can it be accomplished? [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0, (21).
- [11] Richard, T. Christian literature[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00, (31).
- [12] [英]李提摩太.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M]. 李宪堂,侯林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3]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4] 陈喆. 季理斐与广学会文字布道事业的发展[J]. *宗教学研究*, 2013, (1).
- [15] 王美秀,段琦,文庸,等. 基督教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16] 邵玉铭. 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C].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 [17] 中华归主(中册)[Z].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
- [18] [美]简·亨特. 优雅的福音[M]. 李娟,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4.
- [19] Carroll, D., G. Elito. *The Critical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1.
- [20] Headland, I. T. The Nu Erh ching; or classic for girls[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95, (26).
- [21] Wright, C. Our book table[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03, (34).
- [22] Williams, S. W.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880, (11).
- [23] [英]步奈特. 小公主[M]. 亮乐月,周澈朗,译. 上海:广学会,1914.

- [24] 庐隐. 采桑子文丛: 庐隐自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 [25] [美] 欧高德. 四姊妹[M]. 贝厚德, 沈骏英, 译. 上海: 广学会, 1925.
- [26] [美] 欧高德. 竹马天真[M]. 沈骏英, 贝厚德, 译. 上海: 广学会, 1924.
- [27] 朱春红, 杜学元. 母亲教育: 现状成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08, (1).
- [28] 广学会图书目录[Z]. 上海: 广学会, 1916.
- [29] [英] 步奈特. 小英雄[M]. 亮乐月, 译. 上海: 广学会, 1936.
- [30] 广学会图书目录[Z]. 上海: 广学会, 1938.
- [31] Bailey, P. J. *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 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32] 徐文台. 关于收回教育权[J]. 民铎, 1926, (7).
- [33] Lin, C. J.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A]. Rev. Frank Rawlinson(Eds.).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1937*[C]. Glendale: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37.
- [34] Dunch, R. Christianizing confucian didacticism: Protestant publications for women, 1832—1911[J]. *Nan Nü*, 2009, (11).
- [35] 宋莉华. 从《罗慕拉》到《乱世女豪》——传教士译本的基督教化研究[J]. 文学评论, 2015, (1).
- [36] 陶飞亚. 前言[A]. 陶飞亚. 性别与历史: 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by Missionaries for Women Enlightenment and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Women

ZHAO Yan-qiao

Abstract: It is a fact ignored by the mainstream history that from the early 1890s to the late 1930s, Wester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launched an intensiv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activity of Western literature aiming at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women. It was brought about by both practical miss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nurture of Liberal Theology and Social Gospel ideas. With the aid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the missionaries tried to enlighten Chinese women with modern ideas and encourage them to think about their role and condition in society, the themes cover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elf-consciousness,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so on. The modern liberal thoughts introduced and rendered in harmony with Christianity made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women.

Key words: missionaries; Chinese women;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